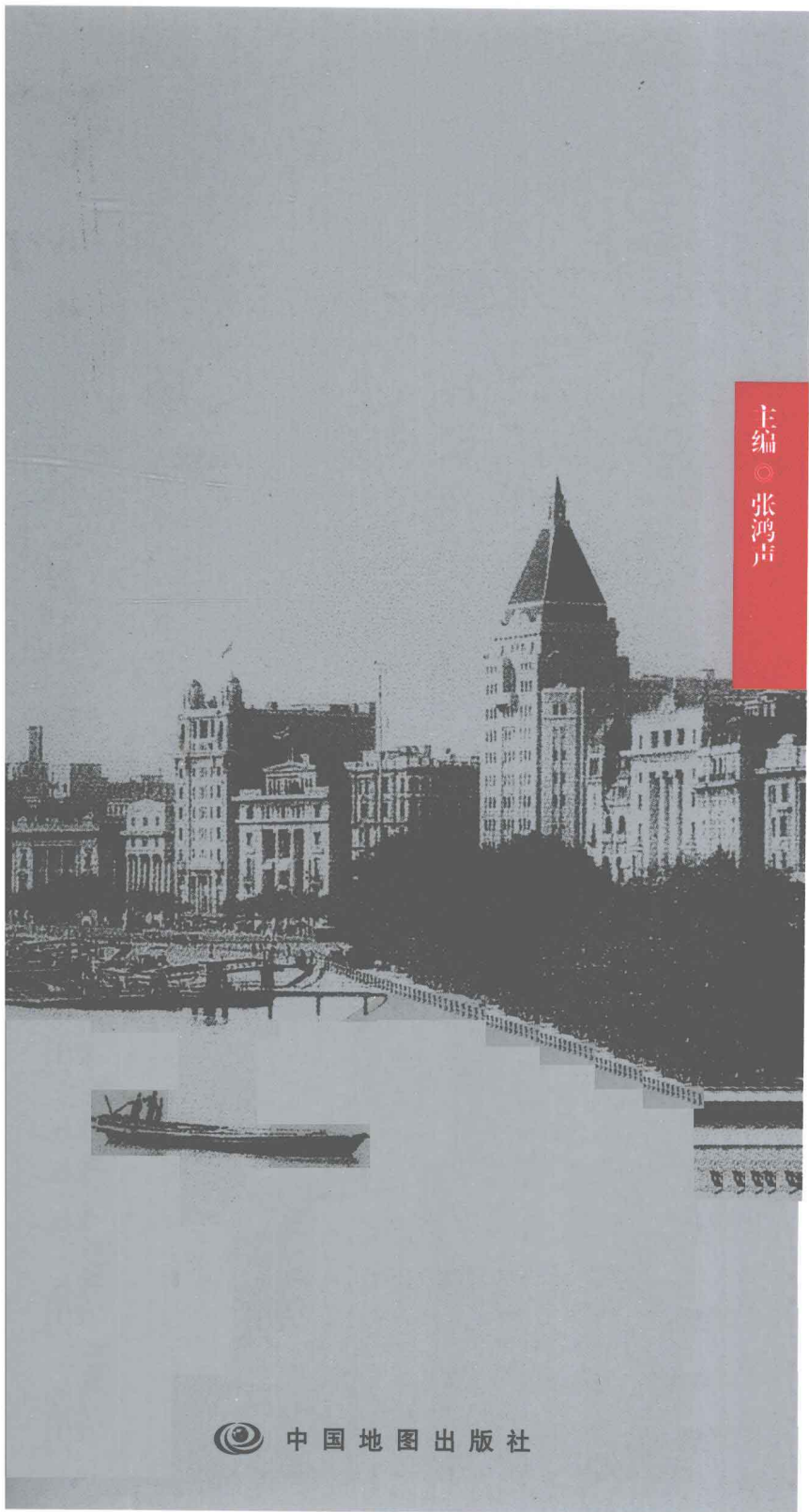


城市文学地图系列丛书

之

# 上海文学地图

主编  
张鸿声



 中国地图出版社

张爱玲、施蛰存、霞飞路、百乐门  
文学的上海，与历史的上海互为印证  
放开想象，文学的旅游之梦近在眼前

# 上海文学地图

张洪声题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文学地图 / 张鸿声主编. —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031-6471-2

I. ①上… II. ①张· III. ①地方文学史—上海市IV. ①I209.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6125号

责任编辑	朱 萌	排版设计	姚维娜
出版发行	中国地图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白纸坊西街3号	邮政编码	100054
电 话	010-83060868	网 址	www.sinomaps.com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成品规格	169mm×239mm	印 张	15.75
字 数	257千字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定 价	36.00元

书 号 ISBN 978-7-5031-6471-2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

# 序

## 文学的上海与经验的上海

陈思和

今年6月我两番南下参加会议，随身都带着张鸿声教授主编的《上海文学地图》的打印稿，行色匆匆，也未必翻阅得了几页，但总也像上瘾似的，能看多少算多少。前一次在香港时，鸿声已经来电话催促写序，我漫声应道，快了快了，回去就写，不料回到上海后又是杂事缠身，暂且放下了。所以这回去香港、走澳门一共才四天，在飞机上、轮船上都像赶考，一路翻阅，还特意提早一天返回上海，趁着电话铃声还没有响起，我想，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把这篇序写出来。

其实，所谓“序”，只是一篇读后感，说说这部书稿勾起我的某些记忆，对书中某些内容略作一点补充和笺注。王国维考据学提出二重证据法，即“地下之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的二重互证。我想人的经验在尚未消失之前，深藏于脑海深处，如同深埋于地底下，把这些经验写出来也如同出土文物一般，若再与书中描写的细节两相对照，亦可证其说不虚。我生在上海，一生中并没有超过半年以上的时间离开过这座城市，又因幼时频频搬迁，原来上海行政区划的十个区十个县中，我倒是居住过其中的五个区，同时还在当时隶属宝山县的复旦大学念书（我毕业留校以后五角场才规划为杨浦区），所以说居住上海的经验，我还是有一些的。当然一篇短序不可能全面铺开我的上海记忆，本文不过略举一二，为读者助兴而已。

书中所叙述的南京路、淮海中路等中心地段，杨浦、虹口那些边缘地段，我都

是居住过的；上海的各式住房，除特别高级的花园洋房和特别低级的“滚地龙”之类我没有住过外，一般老式石库门、新式里弄、街面房、写字楼、工人新村、现代公寓等等，也都领略过风情。正因为如此，这部书稿在我读来非常亲切。这里我想补充两段经验中的小插曲：一段是关于第二章中提到的巴黎大戏院；另一段是在第五章中的，关于闸北的环境。

先说巴黎大戏院。它坐落在淮海中路成都路口，斜对面弄堂直通渔洋里2号，20世纪20年代中共领袖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编辑部就设在这里。戏院两旁是两家食品店，左边是一家野荸荠食品店，右边是一家冬夏点心店，以做赤豆糕等甜食著名。法租界霞飞路屡屡改名，1950年起改为淮海中路，“以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所进行的淮海战役”。巴黎大戏院也跟着改为“淮海电影院”。与戏院为邻的是飞龙大楼，这座大楼后面本来有一个十字形的巴黎商场，中间有露天水池，四周是店铺，主要顾客大约是飞龙大楼上居住或办公的外国人。当时的商铺一般都在楼下，楼上可以住人。到了抗战胜利，巴黎商场已经改观，变成了居民住宅区，大多数房客都是用金条为“定金”住进来的，一楼一底带厨房和卫生间。我在那里住过整整二十年，不过那是在“文革”后期，十字街中间的水池早已被填了土，成了一个花坛。花坛边还有几株夹竹桃、玉兰树，都长得很高大，大概有几十年以上的历史了，年年春天都盛开着花朵。书稿里引用施蛰存先生的小说《在巴黎大戏院》，写一个失意的小知识分子与女友坐在戏院里胡思乱想的意识流，顺便写出了这个戏院的空间逼仄和空气混浊。淮海电影院在20世纪70年代还是二等影院，比国泰、大光明要差一些，但也不是最差的戏院，中等居上。施蛰存先生之所以选这个电影院作为小说场景，可能是这地方比较适合于知识男女约会，因为它不是高档奢华的场所，但在市民的眼里又是一个高雅之处，符合“小资”的身份和情趣。繁华的霞飞路、近旁的巴黎商场和不远的复兴公园（当初大约叫法国公园），也都是闲逛散步的好去处。施先生是接受了西方现代文艺表现手法的作家，他写人物偏重心理描写，又是偏重性心理和猥琐心理的描写，这种手法似乎累及了巴黎大戏院。

不过这不是我要讲的主要内容，要紧的是：巴黎大戏院背后的长乐路上有一条杨家弄，从里面穿过去，在一排石库门中间有一家著名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创办人吴朗西先生就住在这幢楼里。当年他办出版社，合伙人是一批大名鼎鼎的作家：总

编辑是巴金，还有散文家丽尼、陆蠡等等。抗战爆发，巴金、吴朗西等都去了内地，上海的大本营让散文家陆蠡镇守。陆蠡新婚燕尔，雄姿英发，与巴金的哥哥李林、科学家朱洗自成一个文人圈子，办杂志、出丛书、搞翻译、写散文，在恶劣环境下保持了一股知识分子的正气。为了更好地促销图书，陆蠡就在附近的巴黎商场里开设了一个图书门市部。但是好景不长，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开进租界，借口出版社有抗日书籍，查封了巴黎商场的书店，还点名要抓出版社负责人。天真的陆蠡仗着精通法语，自己跑到法国巡捕房去讲理，结果被引渡到日本宪兵队，在魔窟里悄然失踪，没有留下任何档案。20世纪80年代我住在那里，80多岁的吴朗西先生来我家做客，站在我家门口，看着当年的门市部旧址，浑身颤抖不已，与我说了这段往事。

再说说闸北的上海民间生活。闸北不是天生的贫民窟和棚户区，那是中国的中国地界，原来也是热闹富庶之处，我听外祖父说，他当时就住在麦根路（现在的火车站南面秣陵路）附近的一幢洋房里，条件相当好。这一地段因为近火车站，在“一·二八”日本军队进攻上海时，被炸成废墟，从此才一落千丈，沦为贫民窟。战争爆发以后，难民越来越多，上海的居住环境越来越恶劣，闸北之所以首当其冲，可能是因为离老火车站近，人多且杂，交通便利，才造成了鱼龙混杂、藏污纳垢的局面。但在战前，那里文化底蕴也相当深厚，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就设在闸北宝山路上，其对面是号称“亚洲第一图书馆”的东方图书馆，规模之大、设施之新、藏书之丰、善本之众，都是国内一流。当时世界语学会设在宝山路宝光里，轰轰烈烈地推广世界语和人类大同思想，1929年巴金从法国回来，曾经寄居在那里，创作了大量的长篇小说，包括《激流》第一部《家》的前半部。20世纪20年代宝山路上还有一个台湾青年会，许多台湾青年从日本或者台湾到上海都曾在那里寄居和聚会。可以想见，战前的闸北，以商务印书馆为中心凝聚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力量，有多少现代著名知识分子曾在那一带进进出出，从事着庄严的文化建设工作，战争却毁灭了一切。

但是毋庸置疑，闸北不是租界，没有洋人的统治也没有西方文明的熏陶，一切都是中国本土的，也包括了生活中的陋习。我举一个例子，台湾作家张深切1923年到过上海，居住在宝山路的台湾青年会，他这样描写上海老百姓不雅的生活习惯：

每天早晨会馆附近一带臭气熏天，洗马桶的声音，哩哩咧咧不绝于耳。至若到闸北的铁路沿线一看，更呈奇观，一清早人头簇簇，排成长列的白屁股坦然展览大解脱，这种丑态实堪令人羞死。上海的社会现象，无一不使海外回来的侨胞怵目惊心。……租界里的阔人住洋楼，是用西洋卫生马桶，洋洋自得，看租界外的同胞，若异国人，若猪狗牛马，丝毫没有相怜的观念。（转引自许俊雅《有音符的树——台湾文学面面观》）

张深切是一位受激进思潮影响的爱国青年，敏锐地观察到上海殖民性造成的不同生活方式的对立，同时，他批评上海平民生活陋习又带了“五四”启蒙的眼光，方写出这段犀利文字。台湾在甲午海战后沦为日本殖民地，在现代生活设施及卫生观念上可能获得较好提升，犹如上海的租界，但是在当时上海的平民中间，落后的生活陋习基本上没有得到改变。由于公共厕所的缺乏，男人随地大小便的陋习一直延续，到我少年时期还是很普遍的现象，我在上学路上经常看到有男人在路边小便，不足为奇。但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上海市民要在铁路边上集体大解，把现代化的铁路当成了公共厕所。张深切描绘的“闸北的铁路沿线”，应该是指著名的吴淞铁路（后改为淞沪铁路），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条铁路，由洋商修建于1876年，原从现在河南路桥北的天妃宫通过江湾镇到达吴淞口，通车不到一年，因为遭到沿路居民的反对（破坏风水），被清政府花重金买下主权，一段一段拆除；二十年以后，清政府又重新建造，1898年正式通车，全长16公里，途经宝山路、通天庵路、江湾镇到吴淞炮台口，有九个车站。张深切居住在宝山路，应该是指这条铁路。我在童年时居住虹口广中新村，离这条铁路不远，幼年时老是缠着家长要去看火车，多半也是到铁路附近站在那里等火车驰过。我印象中，附近居民都把它当成一条普通马路，铁路两边没有栏杆（或许原先有，但居民为走路方便拆掉了），居民在上面走来走去也不觉得危险。外祖父为了警告我们不要乱穿铁路，特意在火车开过时让我们仔细听火车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我们听了半天也听不出名堂来，外祖父就说，火车开过的声音节奏是：轧死不管——轧死不管——轧死不管……所以你们要小心啊！这个印象，现在还记忆犹新。当年，宝山路是比较热闹的地段，但火车铁路沿线相对僻静，而且有人专职管理清扫，这样渐渐地就成了市民们的方便处了。淞沪铁路在1997年正式拆除，改建交通轨道三号线。

这样的书阅读起来真是有趣味，每一章每一节，鸿声教授与他的团队都作了认真的考证，结合文学作品的描写，将历史的上海和文学的上海互为见证。记得十多年前我在日本东京访问，有朋友计划带我去海边旅游，特意给我看一张东京周围文学地图，图上标出了许多著名作家的足迹所至之处，令人向往。只可惜那次旅行刚刚出发就遇到意外，又折回了东京，成了一个美丽的梦。现在读这本《上海文学地图》才发现，其实文学的旅游之梦就近在身边，只要迈开双脚，放开想象，真是处处有瑰宝。是为序。

2012年7月6日于鱼焦了斋

(陈思和先生，为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著名文学史家，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副会长、上海作协副主席、《上海文学》主编。)





# 目 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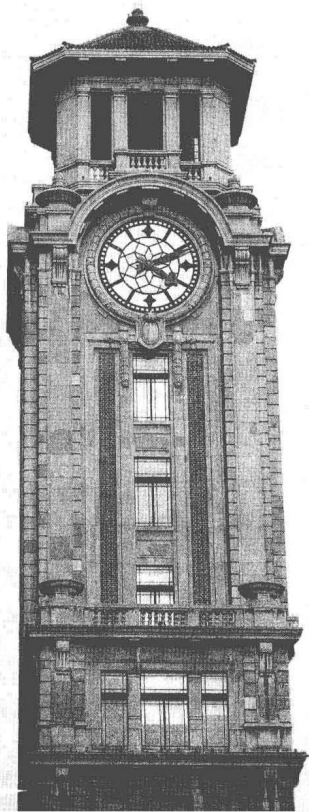
<b>第一章</b>	<b>租界时代的马路</b>	<b>01</b>
	租界筑路	02
	外滩	11
	南京路（南京东路）	21
	静安寺路（南京西路）	30
	霞飞路（淮海中路）	35
	望平街（山东中路）	44
<b>第二章</b>	<b>洋场摩登</b>	<b>57</b>
	跑马场	58
	百乐门	68
	酒吧、夜总会	77
	影院：夏令配克、大光明、巴黎大戏院	84
	百代公司	93

<b>第三章</b>	<b>老中国的记忆：老城、园林与欢场</b>	<b>97</b>
	城隍庙	98
	四马路（福州路）青楼	109
	“海上大观园”——爱俪园	120
<b>第四章</b>	<b>石库门与弄堂</b>	<b>129</b>
	石库门：上海屋檐下	130
	石库门亭子间里的细民生活	140
	弄堂里的人物	146
	弄堂里的声音	155
<b>第五章</b>	<b>虹口与闸北：左翼的上海</b>	<b>163</b>
	内山书店	164
	亭子间与青年左翼作家	172
	多伦路：公啡咖啡馆与景云里	180
	闸北的厂区与棚户	188

<b>第六章</b>	<b>社会主义新上海</b>	<b>197</b>
	从南京路到中苏友好大厦（上海展览馆）	198
	曹杨新村	204
<b>第七章</b>	<b>作家故居的城市地理学</b>	<b>215</b>
	鲁迅与大陆新村（山阴路）	216
	沈从文与善钟里（常熟路）	224
	张爱玲与爱丁堡公寓（常德路）	226
	上海作协与巨鹿路675号	229
	<b>参考书目</b>	<b>234</b>
	<b>后记</b>	<b>239</b>

近代中国的上海租界，「路」成为租界空间构造、延伸与日常消费文化传播的关键载体。上海租界的道路宽敞整洁，生活便利，人们行走其中所感受到的远不仅是通衢之便，更油然而生一种所谓「文明生活」的切身体验。

## 第一章 租界时代的马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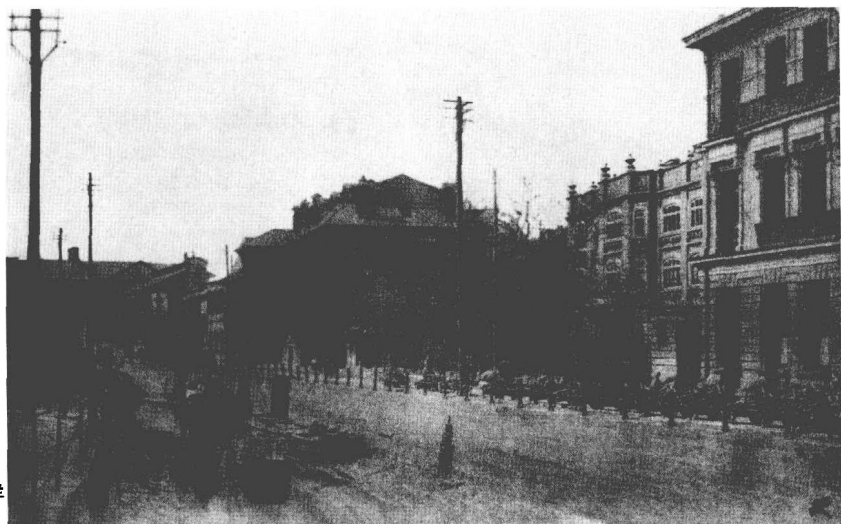
## 租界筑路

如果城市有自己的前世今生的话，毫无疑问，租界就是今日上海的前世。正像法国史学家梅朋·傅立德在《上海法租界史》中写道的的那样：“研究（上海）这个现代化大城市的既往历史，不需要追溯到那个遥远的、几乎是神话中的时代，那时扬子江的波涛还淹没着今天上海这块地方。”

在唐代，宽约12公里的吴淞江（今苏州河）滔滔流过今日上海最为繁华的地段。到了宋代，河床才慢慢变窄至5公里左右，逐渐为两岸人烟蕃息留出了空间。在当时，上海被称为“华亭海”，再由此往后两百年，上海成为明朝设立海关署的七个城市之一，1550年左右上海县开始修筑城墙。

1842年6月上海被英国人占领，1843年11月上海开埠，1845年11月上海第一个租界地——英租界设立。当时签订的《第一次土地章程》中约定：“决定将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之地，准租于英国商人，以为建造房舍及居留之用。”（《上海公共租界史》）所谓“洋泾浜”是当时上海县城北郊的一条小河，而“李家场”则是位于今日北京东路外滩的一个自然村，所以当时英租界之空间范围实不出今日上海延安东路至北京东路的外滩。加上后来确定的英租界的西至，即今日之河南中路，英租界统共不过830亩（约55万平方米），而且大多是僻无人烟之地。但在1848年上海“青浦教案”发生之后，上海英租界的面积已经从830亩扩展到了2800亩（约187万平方米）。上海法租界的设立始于1849年6月，其空间范围相当于今上海黄代路至延安东路，外滩至西藏南路，人民路至延安东路之间的一块狭长的地区。

论及西人在中国设立租界的缘由，多半归因于西方列强藉此窥伺中国领土主权，这固然是毫无问题的，但过于强调这一论调似乎又有所不足，最起码忽略了在主权冲突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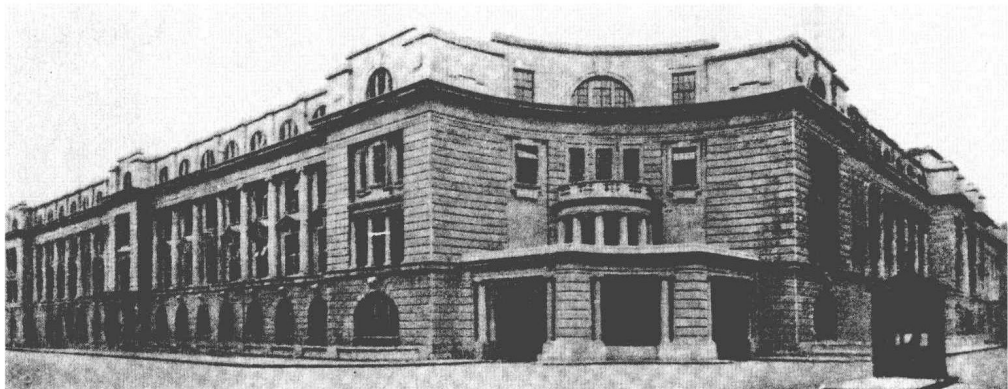


1900年前后的洋  
泾浜租界建筑

盖下的文化冲突问题。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当地居民与洋人“华洋杂居”，因为各自的生活习俗迥异，冲突时有发生，英国领事巴富尔借着这种文化冲突的由头上纲上线，向上海道台提出了为“华洋分居”而设立租界之办法，而上海道台也怕文化冲突升级为政治冲突才答应下来。法租界与美租界之设立，其中同样包含着避免文化冲突的缘由。

然而，来自生活习俗的文化冲突，还只是围绕租界展开的更为广阔、更为深刻的文化冲突的前奏，后者即将随着滚滚而来的经济殖民全面展开。对于英、法、美列强而言，对租界领土主权的争夺其实还是要为其经济倾销做保障，把巨量的工业产品倾销到中国——这个传说中神秘而富有的国度——才是其最终目的。可是，主权争夺是否能够完全为经济殖民铺平垫稳？事情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主权争夺固然可以“臣人以民”，但“买卖东西”毕竟还是你情我愿的互动行为。纯粹的军事侵略与主权殖民只能打开中国租界“市场”的大门，而要使“买卖行为”继续下去，需要的还是“服人之心”，需要的是绵密而深入的“文化劝诱”，在“文化劝诱”中引导人们消费产品，最终实现经济倾销的目的。因此，近代中国租界在西方列强的殖民逻辑中，文化劝诱其实比主权侵夺占有更大的分量。

那么，在租界，与经济倾销相匹配的又是何种文化？回头看看此时英、法、美伴随大工业生产而产生的文明形态，即可了然。在欧洲，17世纪帝王时代之前被称为欧洲文明的古典时期。在古典时期，过度的物质消费被视为一种罪行；但从18世纪启蒙时代以



1854年成立的工部局是公共租界的市政机构。这是建于1913年的工部局大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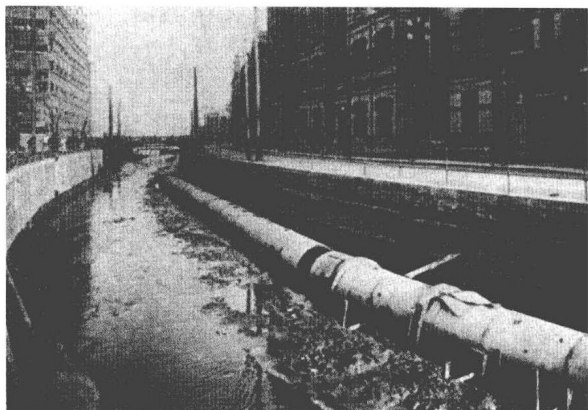
来，伴随着人的全面解放，自由替代宗教成为人的终极信仰，失去了宗教恐吓的人们释放出自我的需求，尤以对物质消费的需求最为强烈。这正与在18、19世纪兴起的大工业生产一拍即合，由此产生了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中最为重要的文明形态——消费文化。消费文化的实质，是削平现实人生中的超越体验，一切还归当下，还归到人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之需中来，以此来彰显人所谓的“自由”与“文明”。

在军事侵夺所打造的主权与行政框架中，打造实现人之消费所需的完美日常生活世界，是近代中国租界实现“文化劝诱”的主要含义，而在租界中，打造完美的日常生活世界，空间构造又是重中之重。在近代上海，租界空间的构造与延伸，是完全顺着日常消费文化的逻辑展开的，并且在历经多次的租界空间扩展之后，形成了盘踞在黄浦江畔、凸显在旧中国腹地的日常消费文化之“飞地”。

近代中国的上海租界，“路”成为租界空间构造、延伸与日常消费文化传播的关键载体。

“路”首先在租界内展开，确切地说是从英国人设立的第一个“跑马场”开始。早在1854年，几个西人出于个人爱好组织了“上海跑马总会”，并以每亩10两白银的价格购买了英租界西界外约80亩（约5.3万平方米）土地，建了一个周长约400米的小型跑马场。但场地实在太小，于是跑马总会又在跑马场出口处开辟了一条东西向的道路，既作遛马又作赛马之用，即今天南京路之所在，在当时被称为“马路”。以后租界又筑了几条与“马路”平行的道路，于是这条最早筑的“马路”被叫做“大马路”，而其他的那几条则依次被叫做“二马路”（九江路）、“三马路”（汉口路）、“四马路”（福州路）、“五

马路”（广东路）等。这是在1860年之前所开之路。1860年初，又添筑南北干道如福建路、广西路、浙江路。到1865年，英租界已形成26条道路的干道系统。这一片以马路为通道的棋盘式街区，方正有序，视野开阔，与上海县城内的道路系统迥然有别。在美租界，1862年



洋泾浜排水工程

建成的“宽阔而好”的道路只有两条：吴淞路和百老汇路（今大名路）。法租界的第一条马路是建于1856年的法兰西外滩马路（今中山东二路），后有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等。

随着马路的延伸，租界土地上出现了各种现代市政设施：1860年，主持马路建设的租界行政管理部门，即工部局，开始对租界内房屋编号并悬挂门牌；1861年，开始在租界内主要干道铺设人行道；1862年，开始铺设马路排水系统，将租界内的积水排入苏州河与洋泾浜；1865年，在南京路外滩与河南路之间安装了首批10盏煤气灯，一年后发展到200盏；1866年，工部局决定在英租界内修建9处消防井……可以设想：对于一个19世纪的中国人而言，这一切是多么不可思议！

浏览当时各种文献，可以发现各个层次的亲历者对当时上海租界之路的整洁开敞都是印象深刻，随手撷拾几则：

法租界与城内毗连而居，地势成长蛇形，西区除一部分香烟厂、各种小制造厂外，洵为住宅，因接近田畴，空气甚佳，一部分富户和西人幽居于此。如霞飞路、环龙路、金神父路、拉斐德路一带，道路平坦，路旁多植木，葱葱苍郁，绿荫横生，巍楼杰阁，参差矗立，春花秋月，风景绝佳，不啻仙境。（《上海风土记》）

还有：“租界马路四通，城内道途狭隘。租界异常清洁，车不扬尘，居之者几以为乐土；城内虽有清道局，然城河之水秽气触鼻，僻静之区坑厕接踵，较之租界几有天壤



之异。”可上海老县城呢？这是一个当时日本游客的亲历体验：

上海县城内除官署、庙堂以外，都是店肆街坊。城内街道极为狭隘，阔只六尺左右，因而行人往来非常混杂拥挤。垃圾粪土堆满道路，泥尘埋足，臭气刺鼻，污秽非言可宣。我为此责问本地人，那回答是：以前并非如此，自从英国人到来后，市场兴盛，街路却变得肮脏。说是因为本地人忙于眼前生计，多被雇为按日论薪的缫丝短工，没有闲暇去关心农作，倘像从前那样来把垃圾运往农田去当肥料，街路自然不会这样不雅观。”（《上海公共租界史》）

上述材料勾画出了这样的空间景观：上海租界的道路宽敞整洁，生活便利，人们行走其中所感受到的远不仅是通衢之便，更油然而生一种所谓“文明生活”的切身体验；与之相比，道路脏污的上海县城令人厌恶的不仅仅是行路不便，而且还有由此所象征的“野蛮生活”。这种“文明”与“野蛮”的对比，与西人刚刚登陆上海时被称为“赤佬”时的情形完全颠倒了。“赤佬”们成了“文明生活”的引导者，而上海当地的“阿拉”们则成了“野蛮人”。而发生这一切的缘由，在于西人搭建了另一个展示和定义“文明”的舞台，那就是道路。这种可切身体验的“文明”日常而感性，吸引着在几千年宗法伦理体系中压抑已久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先前在宗法体系中找不到认同的“有钱人”，他们率先迁入租界享受这种“先进文明”。再到后来，随着中国战局大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租界避难，因为租界能够提供“安全”！当然，在千万人惶惶逃生的大潮中，没有人去想，其实他们生存的“不安全”首先是租界的主子们造成的。

上海租界的“道路”构造了租界的空间，也定义了一种“文明”。这种“文明”的特征是不去寻根问源，而是满足于当下日常生活所需，方便、整洁、温饱与安全。沈从文曾经在《在私塾》中对于租界有这样的比喻，着实生动贴切：“大家来到院中玩捉猫猫的游戏，仓底下成了顶好地方。从仓外面瞧里面，弄不清，里面瞧外又极分明。遇到充猫儿的是胆小的人时，他不敢进去，则明知道你在那一个仓背后也奈何你不得。这下仓底下说来真可算租界！”那个黑黝黝的“谷仓底”下，没有办法做什么大是大非之分，但蔽身其中却尽可以苟全性命，甚至还有余暇去体会存身于乱世的回甘。这就是上海的租界文化，这也是在几千年宗法道德压制下透不过气来、在乱世中挣扎求生的中国